

王赓武——著

黄涛——译


—增订版—

国家与新全球史

更新中国

Renew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

 浙江人民出版社

# 更新中国

国家与新全球史

| 增订版 |

王赓武 —— 著

黄 涛 —— 译

©香港中文大学 2013

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所有版权。香港中文大学授权浙江人民出版社将本书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版限在中国大陆发行。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王赓武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1

书名原文:Renew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

ISBN 978-7-213-08162-0

I. ①更…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历史哲学-研究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3137号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3-253号

## 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

王赓武 著 黄涛 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策划统筹:王利波

责任编辑:潘玉凤

责任校对:朱妍

封面设计:刘俊

电脑制版: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3.5

字数:136千字 插页:6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13-08162-0

定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 Renew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

王赧武

作品

## 前 言

中国之成为激辩的焦点，始自清末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试图重新定义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帝国（empire）让位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中国人开始寻求他们的现代身份，重新设计政治体系并重新书写历史。革命成为新的领导者在—一个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中寻求合法性的源泉。他们很快就发现，要将共和国与他们继承的政治文化协调起来异常困难。他们感到，他们的共和国既不是帝国，也不是民族国家，于是力图通过工业文明和科学，并融合优秀传统，来更新中国。

ix

2008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余英时讲座中提出，这种更新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努力为之奋斗的国家重建过程的核心。从遭遇西方现代民族帝国之后，清帝国的精英们就力图通过革命来抵御外来控制。遭到失败之后，他们转而诉诸传统以保持其作为中国人的意识，同时对那种将中国置于边缘的主流世界历史话语提出挑战。

反思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化过程，我想起钱穆1952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帮助我重新思考中国历史。

x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人如何以中华民国取代了清朝政府，以及为何这一民族主义的大胆尝试出人意外地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结束。1952年，离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仅仅三年，我对此记忆尤深。

余英时当时是钱穆的研究生，因而他应该读过这本书。像他的老师一样，余英时也是一个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从外部省察中国现代化道路之变迁的局内人。他们两人在写作时都怀着今日不复多见的对中国转型的一种感情。在经历了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之后，他们都离开大陆，继续探索是什么使得中国的政治和文明如此独特。

不过，我对中国国家的思考来自一个通常从外部来看待这一主题的华人的视角。大约60年前我去造访钱穆的时候，我的研究课题是关于康有为和孙中山及其在英属马来亚的经历，以及他们与大量生活工作于殖民环境中的中国人的交往。他们两人都看到了西方在亚洲扩张的一些影响。马来亚提供了一种英帝国的视野，即以在伦敦的英国政府的眼光，或者从航行于各大洋的舰船甲板上来看待世界历史。对于他们的帝国历史学家来说，中国是远方一片离奇的大陆，处于全球海上强权的边缘。相比之下，中国历史学家们则在调整他们的世界观，以对这一动态系统中的强弱对比作出反应，并使中国找到自己在新的全球话语中的合适位置。

本书中的论文代表了我对中国人努力建立现代国家和文明的理解。他们解读历史，以求找到理解这样一些问题的线索：中国人如何应对诸如在两千年帝制之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问题，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拥抱现代性来复兴独特的文化

传统。对于这个主题,中国国内及海外已经有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这里所集结的论文并未涉及当前学界的所有讨论。我也意识到用英文写作必然影响我对中国发展进程的描述。有时我所用的词语无法传达中国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所思所想。我意识到,努力将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与源于欧洲史学的概念相匹配,这本身就是正在进行的更新过程的一部分。我相信,为了理解推动当今中国发展的动力,其他人跟我一样,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状况。

王赓武

2012年2月



## 目 录

前 言 | 001

第一章 世界历史中的中国 | 001

第二章 另一种民族国家 | 023

第三章 主权关系并非绝对 | 046

第四章 革命是新的天命 | 068

第五章 现代性、国家与文明 | 85

附 录 天下——境外看中华 | 108

民族国家与天下观念 | 128

全球化时代反思中国历史 | 140

注 释 | 166

索 引 | 198

## 第一章 世界历史中的中国

1

旧中国以今从古，新中国以古从今。对于中国人的历史态度，这样的描述可能过于简单，但是传统文人都在儒家传统中赞颂远古的黄金时代，并用以指引和矫正当下的行动。这一传统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可能存在对线性进步的期待。官方历史记录下各个朝代的兴衰循环证明，那种想要达到甚至超越古代辉煌的努力往往会归于失败。在朝代更迭的记录中，大多数朝代都因过于短暂而无法对统治者及其幕僚提供有益的教训。但对几个大的朝代，如汉、唐、宋和明，人们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以求找到相对成功的范例。即便是北魏、辽、金和元这样几个征服者朝代，也被整合进中国历史的主流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教训。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朝代。这是一个征服者朝代，它是汉人与非汉人观点和制度的一种特殊混合，其影响至今犹存。历史学家们还没有全面地理解它，因此，为清代作正史就显得非常重要。清代历史的书写已经拖延了一个世纪。清朝覆亡之后，遗老们紧接着就展开了撰写一部传统的“标准历史”的

2 工作。逾百名官方学者一起合作，在1927年完成了一部《清史稿》。但是，对于中国的新一代史学研究者来说，这部《清史稿》太过传统，他们认为朝代历史已经完全过时。不过，还是有一些历史学家力图书写清史。而且，应该有一部正统的清史的观念，也始终活跃于毛泽东时代及其后。持这一观点的人最终在2003年获批编写一部完整的清史，他们期望用十年时间来完成这一任务。<sup>[1]</sup>这其实是一份迟来的承认，即承认朝代史的重要性，以及过去对朝代史的理解——不管是在传统的、民族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中——要么是扭曲的，要么是片面的。最终，问题不仅在于写出一部更为准确的清代史，而且在于如何在世界历史中给它一个定位，并将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之前的帝国历史联系起来。

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影响深远，而且能为现在和将来提供有益的类比。当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们开始抛弃儒家历史观时，他们不仅抛弃了对于黄金时代的传统观念，还采纳了一种新的诠释策略，即厚今薄古。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矫正对以往历史的推崇备至，这被指责为导致中国最终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一策略假定的是历史的价值在于其被正确地运用。年轻的历史学者喜欢用以现实为导向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中有哪些部分值得牢记。毛泽东时代之后，在吸收西方社会科学概念以改善或否认以前所接受的概念时，人们有时会重新表述这种策略，以强调以今论古。

让中国历史学家一直难以接受的是，他们悠久的历史只是以现代欧美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的一个远端部分——如果不是

外围部分的话。不过，他们还是准备接受一个观念，即中国历史必须纳入一个新的人类历史当中，虽然他们还不确定最终如何纳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西方历史学家力图超越其欧洲中心论，但是将中国纳入新世界史中的尝试，一直都很艰难，也不那么令人信服。在中国的传统历史学家中，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各方面都是“中央之国”，处于边疆地带的人们经过长期互动最终也会成为中国人。在强盛时期，中国会对外扩张以确立其边界；在衰败时期，中国则收缩其边疆。不过，他们20世纪成功的继承者们，采用帝国、民族、民族国家的视角，使用建立在国际主义目标——如资本主义、专制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术语，对中国进行了彻底改造。有些人热情地拥抱主流的、大多是西方的历史叙述；其他人则很不情愿地接受中国在世界历史中从未占据中心位置。不过，也有人强烈反对用外来的标准来评判那些使中国成为伟大的文明古国的思想和制度。<sup>[2]</sup>

中国人意识到，他们的历史记载总是把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央。对他们而言，欧洲大部分历史都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其现代历史，总以过去四个世纪的世界主导地位为其开端。西方历史学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他们用欧洲术语来解释世界。对中国人来说，这可以理解，因为西方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向欧洲读者解释历史。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史的性质在发生变化。中国历史学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当前的世界史框架是欧洲史的投射，对人和国家的评价标准仍然依靠来自西方或受过西方训练的历史学家。中国历史学家们指出，

4 如果这仍是所有其他历史都得使用的框架，那么歪曲就不可避免，中国历史也就不会是一种真正的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总是别人从欧洲中心的镜头中看到的样子。

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从未间断，特别是当问题涉及现代历史的时候。然而直到最近，书写一部从古至今的全球史的努力仍然罕见。一些欧洲学者，如伏尔泰、利奥波德·冯·兰克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尝试过，后来又有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以及其他关注文明道路的人尝试。20世纪50年代，中国采用了苏联历史学家编写的世界史（其译本也作为他们自己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的基础）。80年代，美国的世界史教科书出现在中国并引起关注。<sup>[3]</sup> 这些书大部分并没有申明他们脱离了欧洲中心的偏见，但是其中一些克服明显偏见的努力可以说还是相当成功的。在这些书当中，不管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更雄心勃勃。作为国际主义的信奉者，他们受到光辉的共产主义未来理念的激励。通过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他们承诺要重新阐述世界史，要将所有种族、所有民族都囊括进朝向更美好世界进发的进步运动之中。今天，这样一种目的论已经噤声，当然不是被拒斥，而是采用了更温和的进步标准。无论如何，乐观主义还在，进步的观念还是很吸引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许诺的将人类从对种族的、民族的、部族的以至阶级的忠诚的镣铐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有很多人依旧相信一种为全人类代言的全球观点，并相信终有一天会有历史学家能够忠实地反映这种全球观点。

现在，更多历史学家致力于编撰一部规避任何中心主义或带民族、地方偏见的世界史。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样一种世界史通常都散漫、零碎、烦琐而了无生气，很少引起广泛的关注。人类的状况并不是符合逻辑、始终一致的，从历史来看，人类也并不仅仅满足于爱、真和美。专业的历史学者，如《世界史杂志》（1990年创刊）的编辑们，试图追求对历史各个方面的一种开放性探究。另一些人则表示，即便是使用欧洲语言进行书写，世界史也可能不带欧洲中心论立场。<sup>[4]</sup>人们可以设想，在中国，除了为中国人书写的中国历史之外，有人还想要读到用中文写的非中国中心论的世界史。写这样一种世界史并不容易，但这种需求是存在的，而且已经有所进展。

5

这一章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现中国历史最终将如何置于一种新的世界历史中去，毋宁说是要考察中国人对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例如，中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帝国的本质，以及中央政府历经多个世纪创建帝国和民族的努力。同时，这一章也将考察将中国的历史文明放在全球视野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以及正在被用来帮助这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那些特征。与此相关的还有，现在的中国人如何看待他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如何利用历史来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正日益紧密相联的世界。以此为起点，他们发现用文化的方式来重写世界历史可以给人类历史带来新的启发。这样一种方式与早先的一些尝试相类似，如伏尔泰，他试图描述人们从野蛮状态中脱离出来向文明状态转变的全球历史。这种变化的观念在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可以与圣王的古老观念联系起来。《易经》

中如下节选概括了这一点：

6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sup>[5]</sup>

天下的一切变化都意味着朝向文明状态的进步，对所有寻求提升的人来说都是如此。从最早的历史记录开始，就有描述人们之间差异的尝试，并把差异的根源归结为气候、环境以及技术和文化。面对变化带来的挑战，有些人从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转变，并号称首先创造了普遍的价值体系。“天下”的概念让中国人可以将这些要素编织成一种单一的历史叙事。在这种单一的历史叙事中，文化成功塑造了他们的文明。后来这一文明得到扩展，囊括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并将之转化为中国人的价值；现在他们又将来自欧洲的新思想包括进去，虽然这些新思想挑战着中国传统的核心。大多数中国人愿意认可，所有这些都是对中国文明的丰富，并且还将继续丰富下去。互动的几个世纪中提供了一种人类持续进步的历史，衡量这种进步的标准是物质的丰富以及道德与精神的成就。中国人既然能用“天下”来拥抱历史上的文明成就，他们也能将其应用于世界历史。<sup>[6]</sup>

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更为核心的问题是对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都产生过重要作用的集权化组织（centralizing organizations）



的政治考量。小的宗族扩展壮大，合并其他宗族，最终能成为国家和民族。它们大多数采取诸如王国和帝国、部族或民族间联盟以及各种各样的国家的政治形式。它们是不不断演变的产物，它们可以在扩张的帝国中聚集起来，然后又分裂成一些小的单元。变化的轨迹可能是循环的，也可能是线性的。没有什么能够持久稳固，人们也知道一种政体很快就会演变成另外一种。

所有这些都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得到了印证。从秦汉到明清的大的王朝更迭，在官方历史中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认识到，在那些朝代中的确发生了重大的改变。<sup>[7]</sup> 掌握权力的不同集团以及他们实际的权力范围，带来的是内在的不稳定性和潜在的无政府主义。于是人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制度来应付环境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环境又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同世界其他部分——特别是横跨中亚以及东亚和东欧的部分——所发生的事件相关联。

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中国人的目标几千年来始终不变。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把偌大的国家统一起来。他们看到了强势领导者的必要性，至于这样的领导者是谁、来自何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否带来稳定，以及能否保证中国文明的繁荣发展，因为这是能否将中国人凝聚起来的关键。为此，尽管不断有来自下层的反叛和来自外界的征服，统治者们所做的仍然是尽力维持秩序。在现代，这种连贯性在对抗西方武力和现代文明冲击的时候凸显出来。那么它会复兴吗？它会怎样影响正在出现的全球话语呢？

今天的主流世界观源于欧洲民族和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它已经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然而，人们意识到这样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来说是欧洲中心论视角的产物，这一视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全方位的扩展。中国人也注意到其他地方的专业历史学家正努力从一种边缘的、更少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来理解以往的历史。他们相信，新的方式部分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经验的主导性比过去减弱了，部分源于对全人类的人文关怀的进步，因为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越来越多。在全球视野变化的今天，正是考察中国学者所能起到的作用的大好时机。

就目前阶段而言，这可以在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其中各个成员国家相互平等——中得到实现。对于平等的肯定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的成立。给予每一个政治实体以平等地位的观念是新颖的，也代表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最具远见的路径。如果各国都能参与到协调一致的行动中来，在理论上就能将世界上的冲突减至最小。但是到目前为止，结果并不理想。为建立联合国达成一致，是在西方盟国战胜了德、意、日三国组成的轴心集团之后，战胜国包括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和中国，他们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被给予了永久成员位置，每一个都对递交到联合国的议题拥有否决权。现在，中国人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意识到，这是一场胜利者的盛宴，它并不能反映目前的权力状况或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真实愿望。因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重写世界史显得为时过早，其修订版本也并未得到广泛认可。<sup>[8]</sup>